

文化周刊

中华读书报

■本版编辑:赵晋华 ■电话:010-67078073

■E-mail:dushubao@263.net 2011年10月12日

第 115 期

民族传统遭遇跨国资本

■陈众议

一切文学都是当代文学

克罗齐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同样,一切文学都是当代文学。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的“世界文学”,便是基于对跨国资本主义的认知。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由于开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了世界性的”,“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因此,其概念完全不同于1827年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的理想主义猜想。盖因在歌德那里,世界文学时代的来临并非建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基础之上,而是出于对《好逑传》或《萨达罗》之类的东方文学的激赏。在他看来,世界文学即各具特色的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并存与交融。这多少在费孝通先生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那儿产生了回音。但遗憾的是这种理想主义已然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市场化全球大众审美趋同中彻底瓦解。

人类的自然需求式生产方式早已被资本驱使下的时尚制造方式所取代。人为的摩登、挖空心思的创意在资本的驱动下不断翻新并制造利润。传统(包括认知、价值观和审美方式)遭到了背弃,家国道义乃至语言向资本我们的生活,麦当劳和肯德基,或者还有怪兽和僵尸、哈利波特和变形金刚正在成为全球孩童的共同记忆。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和审美取向正在令人绝望地全球趋同。与此同时,我们的文化取向也从重道轻器转向了重器轻道。四海为家、全球一村的感觉正在向我们逼近;城市一体化、乡村空心化趋势不可逆转。传统定义上的民族意识正在消亡。

认同感的消解或淡化将直接影响核心价值观的生存。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民族认同感或国家意识的淡化必将釜底抽薪,使资本逻辑横行、拜金主义泛滥,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成为巴比伦塔之类的空中楼阁。因此,为擢升民族意识、保全民族在国家 and 阶级消亡之前立于不败并使其利益最大化,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传统,使承载民族情感与价值、审美与认知的文学经典当代化。这既是优秀文学的经典化过程,也是温故知新、维系系心向心力的必由之路。于是,如何在跨国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传统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面临危机之际,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坚守和修缮我们的精神家园成为极其紧迫的课题。这其中既包括守护优秀的民族传统,也包括吸收一切优秀的世界文明成果,努力使美好的价值得以传承并焕发新的生命。

当然,这不是简单的一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可以迎刃而解。盖因时代有所偏侧,同时也取决于人类社会及人性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朱玲



国文坛的恰恰是山寨版产品,以至于精神垃圾较之有毒食品、伪劣货物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学术伪命题及去心文化现象比比皆是;文学语言简单化(美其名曰“生活化”)、卡通化(美其名曰“图文化”)、杂交化(美其名曰“国际化”)、低俗化(美其名曰“大众化”)等等,以及工具化、娱乐化等去审美化、去传统趋势在网络文化的裹挟下势不可挡。凡此种种所承载或导致的价值混乱和认知错乱愈演愈烈。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然而,危机是全人类的,用古人的话说,“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如今,诸多民族语言正像许多物种一样快速消亡。就连某些西方国家的知识精英也感到了来自本国主要支配者的话语压力。都德所谓“只要法语不亡,法兰西民族将永远存在”的著名论断有可能民族文学作为大到世界观、小至语言、风俗、情感等等的重要载体,正在消亡。其症候之一便是日益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国际化”流行色调。

以上只不过是历史-现实-未来和作家-作品-读者向度或坐标上的一种概说。因此,严肃的文学创作、文学研究必须立足当代,同时又着眼过去,胸怀未来,而不是趋前不顾后式的追逐与同欢,或一味地玩“空手道”,甚至闭门造车,钻牛角尖。

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向马克思主义学习,在认清资本丑恶本质的基础上批判判断跨国资本主义,从而对诸如上春树、纳瓦勒、颠覆性和不可逆性的。不仅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而且人性如此。一切悖逆只不过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如是,跨国资本主义正在使人类价值、审美乃至语言向资本支配者趋同。于是,人类文明的生态危机必然显形,而且已然显形。于是,尽可能地守护美好的民族传统不仅是出于文化生态多样性的需要,更是重情重义的君子之道、人文之道。盖因文学是加法,是不可再造的。套用阿瑞提的话说,如果没有哥伦布,总会有人发现美洲;没有伽利略,也总会有人发现太阳黑子;但若没了曹雪芹,又会有谁来创作《红楼梦》呢?这种不可替代性和偶然性决定了文学作为民族文化基因或染色体的重要地位。当然,这并不是说只有传统的才是美好的,而是在于如何使传统获得升华与新生。瓦格纳的名言是:“不要模仿任何人”。即使模仿也是为了创造的传承,而非简单复制(撒切尔夫人关于中国只产出商品、不输出思想的说法显然是指我们缺乏思想)。

但点题理论的形成并不能一蹴而就,文学理论亦然。当然,我们并非没有可能,更不应坐以待毙。除了探寻和把握事物规律,我们拥有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及国际国内社会实践的经验教训等极为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遗憾的是目前充斥我

危机频发,并在物质和精神双重层面上出现空前深刻的矛盾。

其次,资本无国界的事实导致了“地球村”的产生。它淡化了文化和意识形态冲突,利益冲突则日趋尖锐化、白热化。但利益冲突的主体已由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转向资本支配者,从而使民族国家意识逐渐淡化,直至完全淡出,取而代之以更为宽泛也更为具体的利益群体或个人。近来西方国家极右思潮的抬头多少与此相关:延绵两千年的犹太基督教文化在强大的资本逻辑面前毫无还手之力,一系列传统价值面临瓦解,致使极少数极端保守势力铤而走险。因此,“地球村”一定意义上也可谓“地雷村”。人类面临空前危机:没有是非,只有强弱;没有善恶,只有成败;没有美丑,只有贫富(或冷热)。诸如此类的是非混淆、黑白颠倒、界限模糊的情状以及“人权高于主权”之类的时鲜谬论也只有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才能出现。但重要的是,诸如此类时鲜谬论恰恰承载着跨国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

再次,“多元化”并不意味着文化平等。它仅仅是思想领域的一种狂欢景象,很容易让人麻痹,以为这世界真的已经自由甚至大同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元化”其实也是一个悖论,说穿了是跨国资本主义的一元化。而整个后现代主义针对传统二元论(如男与女、善与恶、是与非、美与丑、西方和东方等等)的解构风潮在否定简单二元论和排中律的同时夸大了李白、杜甫各有所爱的相对性。于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这恰恰顺应了跨国资本的全球化扩张:不分你我,没有中心。于是,网络文化推波助澜,使世界在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和个人主义狂欢面愈来愈莫衷一是、无所适从。于是,我们很难再用传统的方式界定文学、回答文学是什么这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借用昆德拉关于小说的说法,或可称当下的文学观是关乎自我的询问与回答,即甚嚣尘上的个人主义或个性化表演。而这种状况对谁最有利呢?当然是跨国资本。盖因后现代主义留下的虚无状态显然不仅局限于形而上学范畴,其怀疑和解构本质明显具有悲观主义,甚至虚无主义倾向,客观上造就了跨国资本主义时代“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及文学的“去民族化、去地域化”态势。

价值观是最大的软实力

核心价值观阙如的民族绝对不可能是强大的民族。然而,随着跨国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传统价值受到了冲击和解构,以至于传统意义上的民族性与国家意识正在逝去,并将不复存在。认知方式、价值观和审美取向的趋同使年轻一代逐渐丧失了民族归属感和认同感,而四海为家、全

球一村的感觉十分契合跨国公司不分你我、没有中心的去二元论思想。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曾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

而民族虽然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但它归根结底只是个历史概念。犹太基督教思想将民族的发生和发展说成是上帝的安排,并使相关民族以“上帝的选民”自居。其他宗教也有类似的说法。即使在达尔文进化论流行之后,基督教神学等也能自圆其说,谓适者生存只是一种表象,一切皆取决于上帝的意志,否则许多自然及人类演变的偶然性就无法解释。与之不同的是,人类学家摩尔根通过考察美洲印第安部落,对民族的产生作出了相对科学的解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此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方法,将民族与私有制联系在一起,认为建立在氏族、部落、族群基础上的民族乃是私有制发展的需要,继而成为诸多国家的自然基础。由此看来,民族是一系列分化组合、再分化再组合的过程。而且历史使然,有生必有死,一旦私有制消亡了,随之不复存在的便是国家、民族、阶级等等。而种族虽然是纯粹的生物学概念,却与民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为的宗教也是如此。因此,在极端的西方右翼思潮中,民族又常常是与种族和宗教观念联系在一起。

因此,价值观的持守和重建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也是发达国家正在或将要面临的历史课题。

文学作为价值观的重要载体

人类藉人文以流传、创造和鼎新各种价值。文学作为人文明珠,其肌理决定了它作为民族认同的基础和文化基因或精神染色体的功用而存在并不断发展。因此,文学不仅是审美对象,而且是民族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这就牵涉到文学与民族之间那难分难解的亲缘关系。正因为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有人问及席吉尔莎士比亚和印度孰轻孰重时,他说如果非要他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那么他宁要莎士比亚,不要印度。

这就是就一般意义上的民族概念及其与文学的关系而言,实际情况下要复杂得多。比如,中华民族及其民族认同感更多建立在乡土乡情之上。这显然与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

叠、曲径通幽。

如今金门的路面均已硬化,农田里是绿油油的矮化高粱,岛上很少有裸露的土地。道路两旁和山坡上布满茂密的林木,那多数是守岛军队以往栽种的。岛上海风强劲,但已不见沙尘四起。或许那些老房子在海岛的冬季还是比较实用的。水头村还有些与鼓浪屿的“洋楼”相似的住房,以及一些现代小二楼。那里面住的是本村居民。古厝经营者会根据房客的时间表提供早餐,这与大陆的“农家乐”相似。不过他们并不下厨煎炒烹炸,而是骑了摩托到餐馆买早点。这样,餐馆和买主都能分享规模效益。我们十来个分散在相邻院落与会者,每天集中在水头9号院共进早餐。每顿早餐都有新花样,蚵仔粥、煎蛋饼、炸米糕、三明治、豆浆油条、牛奶酸奶、肉丝面线(龙须面)以及热带水果,轮番出现在餐桌上。这个院落的堂屋还可无线上网,我曾带了手提电脑去收发邮件,传输速度很快。

村民灵活的商业头脑随处都有表现。例如,有栋小洋楼被用来开店,围墙上涂了两块惹眼的商品招牌。一为五星红旗打底的毛泽东头像,其实际作坊主卖的是奶茶。另一块白墙黑字,标明为“风狮爷文物坊”,下书涪州陶艺及联系电话和传真号码。我们

几个与会者晚上散步时,遇到金門县府的陈朝金先生和夫人。他们就住在水头村,顺便为我们导游了一次。陈夫人解释说,奶茶作坊主把那红色招牌喷涂在货车厢上,开起来满岛跑,很能吸引顾客。“风狮爷”陶像是岛民用作镇风辟邪的,这家作坊将其发展为比较实用的。水头村还有些与鼓浪屿的“洋楼”相似的住房,以及一些现代小二楼。那里面住的是本村居民。古厝经营者会根据房客的时间表提供早餐,这与大陆的“农家乐”相似。不过他们并不下厨煎炒烹炸,而是骑了摩托到餐馆买早点。这样,餐馆和买主都能分享规模效益。我们十来个分散在相邻院落与会者,每天集中在水头9号院共进早餐。每顿早餐都有新花样,蚵仔粥、煎蛋饼、炸米糕、三明治、豆浆油条、牛奶酸奶、肉丝面线(龙须面)以及热带水果,轮番出现在餐桌上。这个院落的堂屋还可无线上网,我曾带了手提电脑去收发邮件,传输速度很快。

我们的会议地点在金門大学。台湾本岛的发言人多来自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经济所。他们的报告,显示出对大陆社会经济的全方位关注和浓厚扎实的专攻功底。大陆经济所所长张荣丰研究员的讲演,一开场就介绍中共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对“十二五”规划的建议,立刻凝聚起听众的注意力。他基于战略规划的理论和办法,提炼和归纳“十二五”规划的核心价值,并将整个规划解析为不同的战略阶段和环节,探寻总体和分项战略目标实现途径。例如,根据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反推出一条关键战略路径,还用示意图画出不同环节之间的关系。张荣丰解释说,关键战略路径的含义在于,它控制着总战略的时程。这意味着,这一路径上的任何环节的滞后一天,整个战略的完成日期也将推迟一天。鉴于此,他不但筛选出作为突破口的改革环节(构建公平竞争环境,深化垄断

行业改革、资源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等等),而且将这些环节按逻辑排列,并据此估算出改革见效的时间。

在这一基础上,他还推測和阐释了地方政府的行为:在关键战略路径上,每一环节的实施难度都很大,如果不设约束指标,地方领导不可能努力推动战略的落实;在产权改革迟缓的情况下,这些领导者出于个人政治前途的考虑,将会热衷于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而这一环节,实质上处在一条非关键战略路径上。这番分析留给我的深刻印象,就是旁观者清。相形之下,大陆团队对台湾缺少类似的深入研究,但对台湾同行的讲演和金門的一切都有浓厚的兴趣。金門县府和金門大学作为会议接待方,举办了专场座谈会:“中国大陆‘十二五’规划下海西区的发展与金門的定位”。仅从这一主题,即可看出大陆因素对金門经济的显著影响。

在两岸关系缓和之前,金門大约驻军十万人。如今经过部分撤军,一些军事设施已向游客开放。在我看来,岛上多数景点都与昔日的冷战有关:

第一类是坑道。有的是花岗岩山体中开凿出来的暗河,与大海相连,用于战时小艇运输,例如翟山和九宫山坑道。有的是具备防卫功能的村庄

地下路网,因土质松软,一人多高的拱形砖砌通道皆用混凝土浇灌,例如翟村村地道。

第二类是观测所和射击掩体。地上绿草如茵,与迷彩伪装的战壕浑然一体。地下坑道蜿蜒,工事中观测窗、射击点、宿舍、弹药库和粮秣库俱全。射门的警示牌上,书有“盗卖军品弹药最高判处死刑”的字样。

第三类是战场和公墓。对输赢的强调胜于对生命的纯粹尊重,或许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种独特现象。这在大陆的战争遗迹中不难看到,金門的军事景观也不例外。导游林先生介绍,1949年10月下旬,解放军三个团登陆古宁头海滩,激战三天三夜,或被歼或被俘。国共双方交战之惨烈,可以用血流成河来形容。我和一群年轻人随他骑自行车环绕古宁头,看到战争的遗迹只剩下一栋空房外墙上的一点弹洞。村里村外的碑刻、牌楼或雕塑,无不彰显胜利者的骄傲。只是在太武山公墓,我拍摄了来自大陆不同省份的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的墓碑,注意到那些亡者多在30岁左右,还拍下了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的题字,联想到他那悲怆的诗作《望大陆》不知震撼过多少中国人的心灵。这位辛亥革命老人若地下有

知,当为海峡两岸人民日益密切的交流欣慰。

第四类是战史馆和文化馆。这些场馆从不同角度展示着以往的金门战事,其中,烈屿乡文化馆保存着冷战期间的民生资料,例如金门特有的货币、通行证、出海证及其他种类繁多的票证。这使我对那时的严格军管,有了些许感性认识。

第五类是战事衍生物。其一,采用炮弹皮锻制的刀具。制刀作坊为前店后厂,来自台北的吴明泽博士选购折刀时,一不留神割破了中指。赶紧去急救站缝了一颗针,刀具也没买成。这倒让我们见识了,此类钢刀有多锋利。其二,金門酒厂。该厂曾属军方,生产的白酒主要供应岛上驻军。撤军开始后酒厂移交金門县府,转而实行现代公司制度。我曾询问一位酒厂职工,县里为此支付了多少费用。对方不以为然地回答:“一元钱也没有付!军方从县里拿去多少东西啊?建酒厂的地就没有付钱,还有那么多军事设施占地也没有付钱嘛!”

金門酒厂于2004年起就营销大陆,如今在厦门和北京都设有贸易公司。这表明,海峡两岸的经贸往来显著地淡化了冷战气氛。正如烈屿乡的旅游推介片中解说的那样,两岸的和平为人民带来了更多的自由。

感受金門

2011年元月,我去福建晋江调研时途经厦门,顺便到滨海大道看海。站在“一国两制,统一中国”的大标语牌前遥望金門,只见雾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清,不免对彼岸更好奇。9月下旬,我有幸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在金門联合召开的“中国大陆‘十二五’规划与两岸经济交流研讨会”,极大地满足了这份好奇心。

来自北京和台北的会议团队同在水头村下榻,村落距离码头大约十来分钟的车程。村头的岔路口有指示牌,汉字和拼音相对照。我们的住所位于“水头十八间”,据说那是些建于乾隆年间的古厝(老房子)。古厝的式样跟我在晋江乡下见过的老房子相同,屋檐飞翘,雕梁画栋。不同的是,晋江的老房子近乎废弃,水头古厝则外观鲜亮,内里添加了现代装修的卫生间。我住在名叫“四雅堂”的19号小院。这本是水头黄氏长房十三世家的书房,2008年修缮如新。古厝的房间小巧玲珑,但通风不良。后来听说,这与防风防盗的设计有关。明末清初,金門曾为郑成功部队的根据地。为了收复台湾,他命人砍树造船,以至于金門岛上林木凋零风大沙多。加之为了防备倭寇海盗,以前的老百姓有意把房屋造的门窗窄小、院落层